

# 农户农地转出规模及其影响因素差异

## ——基于纯农、兼业和非农三类农户的比较

聂江美<sup>1</sup>, 杨璇<sup>2</sup>

(1.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3; 2.成都土壤肥料测试中心, 四川 成都 610041)

**摘要:** 基于四川和重庆 878 份农户问卷调查数据, 从农户家庭特征和农地资源禀赋、流转条件、收益方面选取变量, 采用 Heckman 两阶段行为决策模型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不同类型农户的农地转出规模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 纯农、兼业、非农三类农户中农地转出发生率分别为 34.23%、56.32% 和 100%, 平均转出规模分别为 2.04、2.08、3.36 亩。纯农户农地转出规模受到家庭社保参与人数、耕地破碎程度、耕作基础条件和农地流转组织方式的正向影响, 兼业户农地转出规模受到家庭社保和农保参与人数、农地流转价格的正向影响和耕地破碎程度的负向影响, 非农户农地转出规模受到家庭抚养比例、常年务工人数、非农收入比重等因素的正向影响和耕地破碎程度的负向影响。

**关键词:** 农地流转; 转出规模; 农户分化

中图分类号: F301.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2013(2018)06-0030-07

### Scale of farmland transfer and the difference of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Comparison among the pure farmers, part-time farmers and non-farm households

NIE Jiangmei<sup>1</sup>, YANG Xuan<sup>2</sup>

(1.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2.Chengdu Soil Fertilizer Testing Center, Chengdu 610041,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questionnaire data of 878 households in Sichuan and Chongqing, this paper uses Heckman two-stage behavioral decision-making model and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model to explore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renting-out scale among the pure farmers, part-time farmers and non-farm household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transfer rate of three types households was 34.23%, 56.32% and 100%, and the average transfer scale was 2.04, 2.08 and 3.36 mu respectively. The scale of farmland transfer of pure peasant households is positively affected by the number of household social security participants, the degree of farmland fragmentation, the basic conditions of farming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farmland transfer. The scale of farmland transfer of part-time peasant households is positively affected by the number of household social security participants and the agricultural insurance participants, the price of farmland transfer, but is negatively affected by the degree of farmland fragmentation. The scale of farmland transfer of non-farmer households is positively affected by the proportion of family support, the number of perennial migrant workers, the proportion of non-farm income, ect, and is negatively affected by the degree of farmland fragmentation.

**Keywords:** farmland circulation; renting-out scale; rural household differentiation

## 一、问题的提出

农地流转取决于农地有效供给和需求<sup>[1]</sup>。近年

来,我国农地流转进程加快、流转规模扩大,但仍存在农地流转自愿程度和农地流转签订合同比例不高、农地流转年限较短、户均流转规模较小等一系列对农地流转市场发育不利的问题<sup>[2-4]</sup>。这极大地影响到经营主体对农地的长期投资、规模利用及集约经营<sup>[5-6]</sup>。农户作为土地经营权流转主体,他们的

收稿日期: 2018 - 11 - 19

基金项目: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 (2013BAJ11B02)

作者简介: 聂江美 (1994—), 女, 湖南益阳人, 硕士研究生。

行为对土地经营权流转政策能否达到预期效果有重要影响<sup>[7]</sup>。因此，以农地流转中农地经营权转出的核心主体——农户为视角探究不同类型农户的农地转出行为决策模式，对理解农村人地关系、优化农地供给和加快推进农地流转市场化具有重要意义。

激励农户转出农地增加农地供给是提升农地流转市场供给活力的重要保证<sup>[8]</sup>。从历史维度看，受工业化、城镇化驱动以及农业比较效益低下胁迫，农户的重心由务农逐步转向务工，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使得一部分农户放弃经营农地，另一部分农户则借以转入农地扩大经营规模。这种分化伴随着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进程的加快进一步加剧，呈现为越来越多的农户基于生计方式转型和城乡居民身份选择的需求而采取不同的农地转出决策。学界对农户农地转出决策的研究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研究农户是否转出农地。农地经营权流转作为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制度补充，被赋予实现规模经营和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期望<sup>[9-10]</sup>。众多学者立足于促进农地供给，相继对农户是否参与农地转出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sup>[7,11-16]</sup>。第二阶段，研究农户的农地转出规模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家庭劳动力特征、家庭耕地特征、家庭经济特征、空间异质性、农地产权安全性等因素均会影响农户的农地转出规模<sup>[17-19]</sup>。第三阶段，研究农户的农地转出模式。通过对不同农地转出模式整体效应的比较，学者们从定性或定量的角度对地区农户农地转出模式选择和创新进行了研究<sup>[20-21]</sup>。相关学者从不同农地转出模式出发讨论了农地转出户的选择及影响因素<sup>[22]</sup>。

在我国经济由二元结构向三元结构转换，然后向一元结构过渡的发展进程中，农村劳动力的就业状况、收入结构以及迁移情况出现明显差异<sup>[23]</sup>，农户群体逐渐产生分化，由此导致农户决策理念和农地流转行为决策模式的不同。如何在农户分化的背景下制定更具针对性的农地流转政策，是推动农地流转发展的关键。基于此，笔者拟构建不同类型农户农地转出规模决策研究框架，利用四川和重庆的农户问卷调查数据，考察不同类型农户农地转出规模行为决策影响因素的差异，为促进农地有效流转提供政策依据。

## 二、理论分析与模型选择

农户作为微观决策主体，其流转决策是在特定环境及不确定条件下做出的决策<sup>[24]</sup>。为解释农户这种基于有限认知条件下的决策行为，本研究引入行为经济学的前景理论构建分析框架。

前景理论的基本假设是“当事人有限理性假定”，其认为影响行为主体决策的内部因素主要包括自身资源禀赋和收益损失认知，外部因素主要有环境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完全性。前景理论将个体决策模仿为编辑和评价两个阶段。编辑阶段包括编码、组合、占优选择等步骤，其中编码阶段受自身资源禀赋、外部环境、市场信息等影响，并根据收益损失认知设置参考点，再通过组合、占优选择等过程分析损益前景；评估阶段是相对于参考点，选择总价值更高的前景进行决策<sup>[25]</sup>。

农户作为有限理性人，其农地转出行为并非完全理性决策，而是依据自身有限理性和所处环境做出的选择，其行为选择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因家庭生产要素配置活动各有偏重，农户可以划分为纯农户、兼业户和非农户。由于农户群体的分化，不同类型农户所拥有的有限认知也有所差别，由此导致了不同类型农户决策时对各类因素的响应方式不同。农户在受到政府影响、市场干扰和未来发展等各类不确定性因素情况下做出的转出规模决策，是有限认知约束下的行为选择，符合前景理论的使用条件。根据前景理论，由于环境的不确定性、信息的不完全性以及分化后不同类型农户的有限认知存在差别，各类农户的理性是有限且存在差异的，这使得其在判断行为决策损益时的参照点不同，如纯农户可能更注重风险规避，非农户可能更注重收益追求，兼业户可能介于二者之间。不同类型农户因在编辑阶段设置的内在参考点有所差别，使其在评价阶段对自身资源禀赋、收益损失、环境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完全性等内外影响因素的认知产生差异，最终导致了行为决策模式的不同(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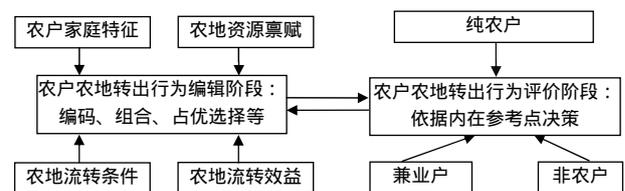


图1 前景理论框架下农户农地转出规模决策模式

结合上述理论分析和相关学者研究成果<sup>[26-27]</sup>, 笔者选取农户农地转出规模的具体影响因素并分析如下:

(1) 农户家庭特征。家庭劳动力人数和家庭抚养比例反映农户家庭劳动力资源禀赋。农户家庭劳动力人数越多, 越倾向于较少转出农地, 而通过自己耕作降低家庭非农生计风险; 家庭抚养比例是指家庭每个劳动人口平均要养活的家庭成员数量。家庭抚养比例越高越倾向于较少转出农地, 通过参与农地经营维持农村生活方式能显著降低家庭抚养的生活成本。家庭常年务工人数越多, 越倾向于增加农地转出规模; 常年务农人数越多, 越倾向于减少农地转出规模。家庭非农收入比例越大, 表明农户非农就业能力越强, 其农地转出规模越大。农户家庭参与社会养老保险和农村养老保险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农地的保障性功能, 因此农户家庭中参与社保和农保的人数越多, 其转出农地规模也就越大。

(2) 农地资源禀赋。农户承包地块数和承包地总面积的比值能反映农户的耕地破碎程度, 农户耕地破碎程度越高, 其放弃耕作而愿意转出增加供给的可能性越大。农户承包地的耕作半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土地的耕作基础条件, 农户的农地耕作基础条件越差, 越倾向于转出农地。

(3) 农地流转条件。农地流转条件主要包括农地流转组织方式和农地流转年限。农地流转组织方式主要包括基层组织引导和自主协商两种方式。自主协商农户的农地转出规模较小, 受基层组织引导而进行流转的农户农地转出规模较大。农地流转年限越短, 农户增加转出规模的可能性越大。

(4) 农地流转效益。农地流转价格影响农地转出农户的收益, 是表征农户收益损失认知的最敏感变量, 对农户的农地转出规模决策影响显著。农地流转价格越高, 农户增加转出规模的可能性越大。

考虑到农户的农地转出行为是典型的两阶段决策行为(包括参与决策和规模决策), 本研究采用 Heckman 两阶段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如果农户没有发生农地转出行为, 其农地转出面积为 0。为避免对农地转出规模模型估计产生选择性偏误, 首先在第一阶段采用 Probit 模型对农户的农地转出参与决策进行分析。模型如下:

$$Y_{i1} = X_{i1}\delta_1 + \alpha + \xi_i \quad (1)$$

若  $Y_{i1}=1$  或  $0$ , 分别表示农户发生农地转出或未转出。其中,  $X_{i1}$  是第  $i$  个样本的变量, 即影响农户流转行为的农户家庭特征、农地资源禀赋等变量;  $\xi_i$  是误差项。

第二阶段估计农地转出规模大于 0 的情况相关自变量的影响。第二阶段利用选择后的样本进行回归分析, 将第一阶段估计得到的转化比率  $\lambda$  作为新的自变量带入第二阶段的农地转出规模模型, 采用 OLS 估计农户的农地转出规模行为。模型如下:

$$Y_{i2} = X_{i2}\delta_2 + \lambda_i + \mu_i \quad (2)$$

$Y_{i2}$  表示转出规模;  $X_{i2}$  表示第二阶段的解释变量, 包括农户家庭特征、农地资源禀赋、农地流转条件和农地流转效益等;  $\lambda_i$  是根据第一阶段计算出来的逆米尔斯比率;  $\mu_i$  是误差项。

对于调查样本中的非农户, 其农地全部转出, 被解释变量只存在“转出规模”, 因此直接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来解释因变量农地转出规模与不同自变量之间的关系, 通过最小二乘法 (Ordinary Least Square) 进行估计, 具体模型公式如下:

$$Y_i = b_0 + b_1X_{1i} + b_2X_{2i} + \dots + b_kX_{ki} + \varepsilon_i \quad (3)$$

式 (3) 中  $Y_i$  为所观测到的被解释变量, 即农户的农地转出规模;  $X_{1i}, X_{2i}, \dots, X_{ki}$  表示第  $i$  个样本中的系列自变量, 与 Heckman 两阶段模型中第二阶段的变量一致, 包括农户家庭特征、农地资源禀赋、农地流转条件和农地流转价格等 4 类共 12 项变量;  $b_0, b_1, \dots, b_k$  为总体回归参数向量, 即各变量对应的估计系数;  $\varepsilon_i$  为服从正态分布的独立残差项。

### 三、数据来源与样本特征

数据来源于 2015 年 6 月至 2016 年 8 月进行的成渝城乡统筹区土地流转调查的农户问卷。农户问卷主要包括农户家庭基本情况、家庭收支情况、家庭资源情况、土地流转情况以及农户认知等五个部分。针对成渝城乡统筹区内地形地貌、社会经济发展程度的差异性, 调查组按照随机选取、全面布点、突出典型的原则, 选取了四川省广汉市、重庆市荣昌区 11 个镇 27 个村 (社区) 作为调查样点。调查样本采取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 先确定每个乡镇的样本总数, 按照不同行政村进行分层, 根据不同行政村的总人数, 对各村抽样人数按比例进行分配,

再在各村（每一层）进行简单随机抽样。为覆盖成渝地区不同农业产业区域，全面反映不同流程度度的各乡镇情况，调查组分别在每个镇选择 3 个左右不同类型的村作为调查对象，每个村的问卷数量在 30 到 40 份之间，共发放问卷 1012 份，收集有效问卷 878 份，有效回收率为 86.76%。

由于研究目的不同，学者对农户类型的划分存在差异，目前针对农户兼业类型划分主要有家庭收入结构和家庭劳动力配置两种方法。本研究参照相关研究<sup>[28-29]</sup>，兼顾家庭收入结构和家庭劳动力配置

两类指标划分农户兼业类型，将年非农劳动时间在 60 天以下的划分为纯农户；当农户年非农劳动时间在 60 天以上的，非农收入占比小于 90%的为兼业户，非农收入占比大于 90%的为非农户。在调查样本的 878 户农户中，纯农户 336 户，兼业户 419 户，非农户 123 户。其中，纯农户、兼业户、非农户中有农地转出行为的农户分别为 115 户、236 户、123 户，分别占各类农户总数比例的 34.23%、56.32% 和 100%，平均转出规模分别为 2.04 亩、2.08 亩、3.36 亩。调查样本的描述性统计特征见表 1。

表 1 变量说明和调查样本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指标	含义	均值	标准差
因变量	阶段 1：农地是否转出	是=1；否=0	0.54	0.50
	阶段 2：农地转出规模	转出面积（亩）	1.30	1.77
农户家庭特征	家庭劳动力人数	家庭劳动力数量（人）	3.01	1.26
	家庭抚养比例	家庭总人口/劳动人口	1.63	0.81
	常年务工人数	农户家庭常年务工人数（人）	1.42	1.17
	常年务农人数	农户家庭常年务农人数（人）	1.44	0.93
	非农收入比重	非农收入占当年家庭收入比例（%）	75.09	29.60
	家庭社保参与人数	家庭参加社会养老保险人数（人）	0.18	0.47
	家庭农保参与人数	家庭参加新农村养老保险人数（人）	0.75	0.96
农地资源禀赋	耕地破碎程度	承包耕地块数/承包耕地总面积（块/亩）	2.68	1.75
	耕作基础条件	最远承包耕地地块到居住地距离（米）	661.10	486.31
农地流转条件	农地流转组织方式	1=基层组织引导；0=自主协商	0.58	0.49
	农地流转年限	流转交易双方约定的流转年限（年）	9.18	9.19
农地流转效益	农地流转价格	流转每亩农地的价格（元/亩）	603.37	470.79

#### 四、模型估计结果及其分析

本研究在模型选择中采用了两阶段 Heckman 模型分析农户的转出行为和转出规模的影响因素，主要目的是为了避免样本农户中转出规模为 0 的农户数据对转出规模影响因素模型运行产生选择性偏误。本研究的主要重心在于农户转出规模决策的影响因素，因此为简化分析，只探讨三类农户转出规模决策的模型结果。运用统计分析软件 Spss22.0 运行模型，对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得到三类农户农地转出规模的 OLS 模型估计结果(表 2)，具体解释如下：

(1) 农户家庭特征的影响。农户家庭特征对三类农户的农地转出规模均有影响，但具体影响不同。对于纯农户而言，家庭社保参与人数对农地转出规模产生正向影响。纯农户对承包地的保障功能期望较高，社保对于纯农户的土地保障功能具有显著的替代性，纯农户家庭社保参与人数越多，其农地转出规模越大。对于兼业户而言，家庭社保参与

人数和家庭农保参与人数对农地转出规模产生正向影响。兼业户大都存在代际分工的家庭劳动力配置方式，即年老一辈劳动力保持农地经营和年轻一代外出务工。当家庭社保参与人数越多，农户家庭生计抗风险能力越强，对土地保障依赖的程度也就越低，其农地转出规模也就越大。家庭农保参与人数是指农户家庭参与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简称新农保）的人数，由于新农保是年满 60 周岁的农村老年居民可以领取养老金，且农民参保的累计缴费不少于 15 年，因此家庭农保参与人数越多，说明该农户家庭劳动力老龄化趋势增强。当家庭农保参与人数越多，其农户家庭成员的老龄化趋势增强，农地经营能力在逐渐下降，因而农户的农地转出规模增加。对于非农户而言，家庭抚养比例、常年务工人数、非农收入比重和家庭农保参与人数均对其农地转出规模产生正向影响。农户家庭抚养比例越大、家庭农保参与人数越多，其家庭年长和年幼成员比例越大，家庭劳动力资源也就越稀缺；从

比较效益来看,农户将稀缺的劳动力资源投入到非农就业并将农地转出获取收益是一种理性决策。家庭常年务工人数量越多,非农收入比重越高,非农户非农生计活动越稳定,其城镇转移就业安家的潜力也越大,因此农地转出规模越大。

(2) 农地资源禀赋的影响。耕地破碎程度对三类农户的农地转出规模均有影响,但影响方向不同。对于纯农户而言,耕地破碎程度越大,其农地转出规模增加。耕地破碎程度直接影响农户农地经营的耕作成本和规模效益实现。耕地越破碎,纯农户进行农地经营的投入会越大,在农地经营投入与产出比较下,纯农户的农地转出规模将增加。对于

兼业户和非农户而言,耕地破碎程度越大,农户的农地转出规模越小。原因可能在于兼业户和非农户的收入水平和非农收入比重相较于纯农户都更高,只需要零散的地块耕作维持农村的基本生活消费方式。同时破碎程度越高的耕地其流转交易成本越高,对于农地转出较纯农户更为活跃的兼业户和非农户,其耕地破碎程度越大,农地转出规模反而越小。耕作基础条件对纯农户的农地转出规模有正向影响。居住地到承包地距离越远,纯农户进行耕作时需花费的时间、劳动力以及运输等农地经营成本越高,因此其农地转出规模越大。

表 2 不同类型农户的农地转出规模影响因素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纯农户		兼业户		非农户	
	Coef.	$P> z $	Coef.	$P> z $	Coef.	$P> z $
家庭劳动力人数	-0.3839	0.1650	-0.0261	0.8900	0.1848	0.2060
家庭抚养比例	-0.1922	0.2490	-0.0507	0.6450	0.4205***	0.0080
常年务工人数量	0.1898	0.5210	0.0468	0.8020	0.4490***	0.0000
常年务农人数	0.3541	0.2620	-0.1959	0.3400	-0.0196	0.9120
非农收入比重	0.7849	0.1610	0.0850	0.7880	2.1989***	0.0090
家庭社保参与人数	1.0446***	0.0000	0.6502***	0.0000	0.0780	0.7500
家庭农保参与人数	0.2261	0.1230	0.3068***	0.0000	0.2228*	0.0880
耕地破碎程度	0.4605***	0.0000	-0.5344***	0.0000	-0.2871**	0.0210
耕作基础条件	0.0016***	0.0000	0.0004	0.1360	0.0004	0.2310
农地流转组织方式	0.9978***	0.0010	-0.1118	0.5440	-0.3753	0.3380
农地流转年限	-0.0092	0.6370	0.0029	0.7520	-0.0180	0.3440
农地流转价格	0.0004	0.2550	0.0004*	0.0900	0.0014***	0.0000
常数项	-4.1639***	0.0000	2.0916**	0.0030	-1.9994*	0.0900
$\lambda$	0.8051**	0.0500	-0.1156*	0.0720	-	-
	Wald chi2 ( 13 ) =108.04		Wald chi2 ( 13 ) =156.42		R-squared= 0.5915	
	Prob > chi2=0.0000		Prob > chi2=0.0000		Prob > F=0.0000	

注: \*、\*\*、\*\*\*分别表示在 0.1、0.05 和 0.01 水平上显著。

(3) 农地流转条件的影响。农地流转组织方式对纯农户的农地转出规模有正向影响。在参与转出的 115 户纯农户中,由基层组织引导流转的农户农地转出平均规模为 2.69 亩,自主协商流转的农户农地转出平均规模为 1.02 亩。对于纯农户而言,主要生计活动为农业,主要职业身份为农民,主要社会关系在农村,其生产生活在很大程度上还要依赖于基层组织,因此,在农地转出问题上,纯农户对基层组织的响应程度更高。农地流转条件对兼业户和非农户的农地转出规模影响不显著。原因可能在于兼业户和非农户的非农生计活动支撑较强,削弱了农户对土地和农村社会关系的依赖程度,导致农地流转组织方式和农地流转年限对农户的农地转

出规模的影响不显著。

(4) 农地流转效益的影响。农地流转价格对三类农户的农地转出规模影响不同。其中,农地流转价格对纯农户的农地转出规模影响不显著,而在 10% 的显著水平上正向影响兼业户的农地转出规模,在 1% 的显著水平上正向影响非农户的农地转出规模。对于纯农户而言,农户农地转出规模决策的主要考量仍然是“安全”,即认为农地具有较难替代的保障功能,目前的流转价格水平还难以抵消已有的土地情结。对于兼业户和非农户而言,家庭耕地资源所承担的保障功能相当有限,当农地转出有利可图时,农户选择转出农地。而兼业户和非农户的比较结果表明,非农户对农地依赖程度更低,其对农

地流转价格响应的敏感程度更高,农户农地转出规模决策的主要考量已经由“安全”变成了“经济”。

## 五、结论及政策含义

上述研究表明:一是不同类型农户的农地转出规模影响因素不同,纯农户的农地转出规模受到农户家庭特征、农地资源禀赋和农地流转条件影响,兼业户和非农户的农地转出规模受到农户家庭特征、农地资源禀赋和农地流转效益影响;二是同一影响因素对不同类型农户影响程度不同,家庭社保参与人数对纯农户和兼业户的农地转出规模具有正向影响而对非农户无显著影响,家庭农保参与人数和农地流转价格对兼业户和非农户的农地转出规模具有正向影响而对纯农户无显著影响;三是同一影响因素对不同类型农户影响方向不同,耕地破碎程度对纯农户的农地转出规模具有正向影响而对兼业户和非农户产生负向影响。

上述研究结论具有以下政策含义:在农地流转过程中应根据农户分化情况因户施策。一是针对纯农户要多措并举弱化其土地依赖程度,通过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和加强农民技能培训增强纯农户的非农就业能力和离土后的抗风险能力,然后引导其参与农地转出增加农地流转供给。二是针对兼业户和非农户,要创新能保障农户利益和放活农地经营权的价格调控机制,通过加强经济诱导其增加转出规模提升农地流转供给参与程度。三是构建政府性和市场性的多元农地流转平台,创造规范有序的农地流转环境,降低农地流转双方的交易成本,从供给侧推进优质供给与重点需求高效匹配,为农地流转的规模实现和效益提升提供保障。四是加强农地流转的法律和制度建设,完善农地流转交易的规范性,为保障农户的产权稳定性和强化其产权预期提供坚实保障。

### 参考文献:

- [1] 钱忠好. 农地承包经营权市场流转:理论与实证分析——基于农户层面的经济分析[J]. 经济研究, 2003(2): 83-91.
- [2] 黄延信, 张海阳, 李伟毅, 等. 农村土地流转状况调查与思考[J]. 农业经济问题, 2011(5): 4-9.
- [3] 钱忠好, 冀县卿. 中国农地流转现状及其政策改进——基于江苏、广西、湖北、黑龙江四省(区)调查数据的分析[J]. 管理世界, 2016(2): 71-81.
- [4] 冯艳芬, 董玉祥, 刘毅华, 等. 基于农户调查的大城

- 市郊区农地流转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以广州市番禺 467 户调查为例[J]. 资源科学, 2010, 32(7): 1379-1386.
- [5] 郜亮亮, 冀县卿, 黄季焜. 中国农户农地使用权预期对农地长期投资的影响分析[J]. 中国农村经济, 2013(11): 24-33.
- [6] 黄迈, 董志勇. 复合型现代农业经营体系的内涵变迁及其构建策略[J]. 改革, 2014(1): 43-50.
- [7] 杨卫忠. 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中的农户羊群行为——来自浙江省嘉兴市农户的调查数据[J]. 中国农村经济, 2015(2): 38-51.
- [8] 孙小龙, 郜亮亮, 郭沛. 村级产权干预对农户农地转出行为的影响——基于鲁豫湘川四个省的调查[J]. 农业技术经济, 2018(11): 20-29.
- [9] 丰雷, 蒋妍, 叶剑平. 诱致性制度变迁还是强制性制度变迁?——中国农村土地调整的制度演进及地区差异研究[J]. 经济研究, 2013(6): 4-18, 57.
- [10]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中国土地问题》课题组, 张曙光. 土地流转与农业现代化[J]. 管理世界, 2010(7): 66-85, 97.
- [11] 赵丙奇, 周露琼, 杨金忠, 等. 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土地流转方式比较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对浙江省绍兴市和安徽省淮北市的调查[J]. 农业经济问题, 2011(11): 60-65.
- [12] 钟晓兰, 李江涛, 冯艳芬, 等. 农户认知视角下广东省农村土地流转意愿与流转行为研究[J]. 资源科学, 2013, 35(10): 2082-2093.
- [13] 冀县卿, 钱忠好, 葛轶凡. 如何发挥农业补贴促进农户参与农地流转的靶向作用——基于江苏、广西、湖北、黑龙江的调查数据[J]. 农业经济问题, 2015(5): 48-55, 110-111.
- [14] 黄枫, 孙世龙. 让市场配置农地资源:劳动力转移与农地使用权市场发育[J]. 管理世界, 2015(7): 71-81.
- [15] 王兴稳, 钱忠好. 教育能促进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吗——基于江苏、湖北、广西、黑龙江 4 省 1120 户农户的调查数据[J]. 农业技术经济, 2015(1): 11-21.
- [16] 姚洋. 中国农地制度:一个分析框架[J]. 中国社会科学, 2000(2): 54-65, 206.
- [17] 马贤磊, 仇童伟, 钱忠好. 农地产权安全性与农地流转市场的农户参与——基于江苏、湖北、广西、黑龙江四省(区)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J]. 中国农村经济, 2015(2): 22-37.
- [18] 付江涛, 纪月清, 胡浩. 新一轮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是否促进了农户的土地流转——来自江苏省 3 县(市、区)的经验证据[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 16(1): 105-113, 165.
- [19] 王亚运, 蔡银莺, 李海燕. 空间异质性下农地流转状况及影响因素——以武汉、荆门、黄冈为实证[J]. 中国土地科学, 2015, 29(6): 18-25.
- [20] 姜松, 王钊, 曹峰林. 不同土地流转模式经济效应及

- 位序——来自重庆市的经验证据[J]. 中国土地科学, 2013, 27(8): 10-18.
- [21] 梁发超. 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模式探讨[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 16(1): 26-30.
- [22] 杨璇, 杨朝现, 陈荣蓉, 等. 出租还是入股: 农地转出户的选择及影响因素[J].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8, 43(1): 135-141.
- [23] 李克强. 论我国经济的三元结构[J]. 中国社会科学, 1991(3): 65-82.
- [24] 陈超, 任大廷. 基于前景理论视角的农民土地流转行为决策分析[J].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11, 32(2): 18-21.
- [25] 李文瑛, 肖小勇. 价格波动背景下生猪养殖决策行为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前景理论的视角[J]. 农业现代化研究, 2017, 38(3): 484-492.
- [26] 刘文勇. 关于中国农地流转的一个制度分析——范式、实证与反思[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 87-124.
- [27] 何欣, 蒋涛, 郭良燕, 等. 中国农地流转市场的发展与农户流转农地行为研究——基于 2013~2015 年 29 省的农户调查数据[J]. 管理世界, 2016(6): 79-89.
- [28] 任天驰, 康丕菊, 彭志远, 等. 欠发达地区农户兼业对其土地转出行为的影响——基于云南省 558 户农户的调查[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2018, 23(7): 205-216.
- [29] 王兆林, 杨庆媛. 农户兼业行为对其耕地流转方式影响分析——基于重庆市 1096 户农户的调查[J]. 中国土地科学, 2013, 27(8): 67-74.

责任编辑: 李东辉

(上接第 21 页)

- [16] Pitt M M, Lee L F. The measurement and sources of technical inefficiency in Indonesian weaving industry[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981, 9(1): 43-64.
- [17] Schmidt P. Frontier production functions[J]. Econometric Reviews, 1985, 4(2): 289-328.
- [18] Bauer P W. Recent developments in econometric estimation of frontiers[J].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1990, 46(1-2): 39-56.
- [19] Battese G E, Coelli T J. A model for technical inefficiency effects in a stochastic frontier production function for panel data[J]. Empirical Economics, 1995, 20(2): 325-332.
- [20] 张忠明, 钱文荣. 农户土地经营规模与粮食生产效率关系实证研究[J]. 中国土地科学, 2010, 24(8): 52-58.
- [21] 杨皓天, 刘秀梅, 句芳. 粮食生产效率的随机前沿函数分析——基于内蒙古微观农户层面 1312 户调研数据[J].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16, 30(12): 82-88.
- [22] 吴昭雄. 农业机械化投资行为与效益研究[D]. 武汉: 华中农业大学, 2013.
- [23] 弓秀云, 秦富. 贫困地区农业劳动力产出弹性分析[J]. 中国农村观察, 2006(5): 13-17.
- [24] 李谷成, 梁玲, 尹朝静, 等. 劳动力转移损害了油菜生产吗?——基于要素产出弹性和替代弹性的实证[J].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1): 7-13.

责任编辑: 李东辉